向秀的处世之道

孙 明 君

(清华大学 人文学院, 北京 100871)

摘　要: 魏晋玄学的根本问题在于如何看待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主流观点认定向秀主张名教即自然,致力于名教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调和。然而,据传世文献征引的向秀《庄子注》及向秀仕宦经历判断,向秀并无意调和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他的处世之道或可概括为“顺名教而任自然”。顺名教只是手段,任自然才是目的。此处世之道导源于庄子的“顺人而不失己”。从任自然的角度看,向秀的“顺名教而任自然”更接近于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而远离于郭象的“与世同波而不自失”。向秀“顺名教而任自然”的处世之道在东晋南朝时代产生过一定的社会影响。

关键词: 向秀;魏晋玄学;名教;自然

中图分类号:I 206. 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20)02-0052-08

魏晋玄学的根本问题是如何看待名教与自然的关系。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对名教与自然的态度极为引人关注。谢灵运《辨宗论》首先提出“昔向子期以儒道为壹”,此后主流观点认为向秀在致力于调和名教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向秀通过注解《庄子》对儒道两家的经典进行互解,试图使儒道两家的分歧通过字句上的精心诠释而得以化解,从而为“名教即自然”理论奠定了思想基础。这种认定向秀在致力于调和名教与自然关系的说法,将名教等同于自然,并不符合向秀的思想。在主流观点之外,曾有个别学者提出了相反看法,例如李凯先生认为:“由向秀的人性观,可引申出与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相类似的观点——伸张个性、顺任自然。这便是向注之主旨。”①笔者认同这一观点,惜乎该说未强调向秀对待名教的态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以为只有用“顺名教而任自然”才能准确地概括向秀的名教与自然观。以下拟从向秀“顺名教而任自然”的哲学展示与仕宦践行、向秀名教与自然观的历史影响等方面展开析论。

一

名教,以名为教,本是儒家思想的代名词;自然,崇尚天然、本然,本是老庄思想的代名词。到了魏晋之际,名教与自然这两个概念在保留传统定义的基础上,又添加了一些新成分。竹林名士面对的名教其实包含三重含义:一是汤武周孔之道,即传统的儒家思想。除了嵇康之外,竹林名士都不反对汤武周孔之道。而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宣称自己“非汤武而薄周孔”也是出于疾愤之言。二是礼法之士所宣扬的名教,这伙人以忠孝仁义礼信为标榜,全力维护“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和伦理制度。三是司马氏集团提倡以名教治天下,它其实是一种为篡逆提供服务的理论武器和迫害异己的手段。此时如何看待名教实际上取决于名士对待司马氏集团的政治态度。在竹林七贤中,只有嵇康一个人敢于高举“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大旗来对抗司马氏政权,阮籍向秀诸人不仅不敢直接与司马氏对抗,反而先后进入司马氏手下任职。《水经注》卷九《清水》篇“清水出河内修武县之北黑山”句下注云:“魏步兵校尉陈

收稿日期:2019-09-18

作者简介:孙明君,男,甘肃静宁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① 李凯:《向秀〈庄子注〉主旨之蠡测——从向郭人性观的差异切入》,《哲学研究》2016 年第 6 期。

留阮籍,中散大夫谯国嵇康,晋司徒河内山涛,司徒琅邪王戎,黄门郎河内向秀,建威参军沛国刘伶,始平太守阮咸等同居山阳,结自得之游,时人号之为‘竹林七贤’,向子期所谓山阳旧居也。”①竹林七贤中只有两人属于魏朝官员,其他五人属于晋朝官员。且阮籍任步兵校尉之时,司马氏已经掌握朝廷大权。除了嵇康之外,其余六贤都不拒绝与司马氏合作。

竹林名士所谓的自然是指老庄之道。政治态度截然不同的七贤之所以能走在一起,成为一个名士集团,共同之处就在于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喜好老庄,起码在竹林之游期间他们都曾经标榜自己崇尚老庄思想。虽然任自然是嵇康和向秀的共同追求,但因为他们对名教的理解不同,致使他们所任的自然也有一定区别:嵇康反对名教,以自然来对抗名教,其自然更加纯粹,属于千古豪杰之士的自然;向秀在顺从名教的同时因任自然,其自然则显得较为驳杂,属于淡泊名利之士的自然。

向秀的玄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庄子注》中。今本郭象《庄子注》中应该包涵不少向秀的思想,但其中哪些是向秀的思想,哪些是郭象的思想,学术界并没有一致看法。向秀《庄子注》至少在宋代已经失传,好在张湛《列子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等传世文献中征引了不少向秀《庄子注》原文。有学者统计,“张湛《列子注》、陆德明《经典释文》各引 30 余条,《养性延命录》引 4 条,东晋罗含《更生论》引 1 条,《世说新语·文学》注引 1 条,《文选》李善注也引数条”。② 这些文献构成了我们研究向秀思想的第一手材料。《世说新语·文学》:“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③《晋书·向秀传》:“雅好老庄之学。庄周著内外数十篇,历世才士虽有观者,莫适论其旨统也,秀乃为之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④向秀的造诣达到了“妙析奇致,大畅玄风”“发明奇趣,振起玄风”的哲学高度,其玄学思想当是极为丰富的。“顺名教而任自然”乃是我们对其处世之道的概括。

在向秀玄学思想体系中,与自然、名教关系最密切的表述是“自然无心”。张湛《列子注·黄帝》引向秀注:“得全于天者,自然无心,委顺至理也。”⑤陆德明《经典释文》引:“翛然,自然无心而自尔之谓。”⑥向秀第一次将“自然”与“无心”并列,提出了“自然无心”这一玄学概念,只有“自然无心”才可以“得全于天”,他要求士人“自然无心而自尔”。这里的自然就是“顺名教而任自然”中的自然,向秀曰:“萌然不动,亦不自止,与枯木同其不华,死灰均其寂魄,此至人无感之时也。夫至人其动也天,其静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湛也渊嘿。渊嘿之与水流,天行之与地止,其于不为而自然一也。”⑦向秀的“自然无心”思想在社会影响上也发挥了引导士人“任自然”的效果,《世说新语·文学》注引戴逵《竹林七贤论》云:“秀为此义,读之者无不超然,若已出尘埃而窥绝冥,始了视听之表,有神德玄哲,能遗天下,外万物。虽复使动竞之人顾观所徇,皆怅然自有振拔之情矣。”⑧所谓的“遗天下,外万物”就是“任自然”的效果。

向秀《庄子注》说到“无心”处甚多,张湛《列子注》中征引的有:“变化颓靡,世事波流,无往不因,则为之非我。我虽不为,而与群俯仰,夫至人一也,然应世变而时动。故相者无所用其心,自失而走者

---

① 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北京:中华书局 2013 年版,第 214 页。

② 韩国良:《论向秀〈难养生论〉的双簧性质》,《衡水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年 3 期。

③ 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 2012 年版,第 243 页。

④ 房玄龄等:《晋书》卷四九,北京:中华书局 2012 年版,第 1374 页。

⑤ 杨伯峻:《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 2010 年版,第 51 页。

⑥ 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 2012 年版,第 234 页。

⑦ 杨伯峻:《列子集释》,第 72 页。

⑧ 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第 243—244 页。

也。”①“无心以随变也,泛然无所系者也。”②“达其心之所以怒而顺之也。”③“苟无心而应感,则与变升降,以世为量,然后足为物主而顺时无极耳”④“唯无心者独远也。”⑤陆德明《经典释文》征引的有:“专所司察而后动,谓之官智;从手放意,无心而得,谓之神欲。”⑥无心也就是“无所用其心”,无心是任自然基础上的无心,无心是对世间所有事物的无心,当然也包括对名教的无心。向秀说“达其心之所以怒而顺之也”“应世变而时动”“无心以随变也”,充分表明,面对名教,向秀会采用“顺”名教的态度。这个顺名教是在任自然基础上的顺,向秀说:“虽进退同群,而常深根宁极也” “夫水流之与止,鲵旋之与龙跃,常渊然自若,未始失其静默也”⑦“居太冲之极,浩然泊心,玄同万方,莫见其迹”⑧,所以说“自然无心”也就是“顺名教而任自然”的另一种表述。我们之所以选择“顺名教而任自然”,是因为它更清楚地标明了向秀对待自然和名教的态度,同时也便于与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进行对照。

向秀“顺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导源于《庄子》。《庄子·外物》云:“唯至人乃能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己。”⑨向秀的“顺名教而任自然”也就是庄子“顺人而不失己”思想的另一种说法。《庄子》一书中展现出三重不同的人格境界。一是理想的人格境界,它出现在《庄子·逍遥游》中:“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⑩一是隐士的人格境界,庄子自己就是这种人格的代表。《庄子·天下》:“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其书虽瑰玮而连犿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諔诡可观。彼其充实不可以已,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⑪一是朝廷之士中因任自然者的人格境界。《庄子·人间世》借仲尼之口说:“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⑫相对于分散且小众的隐士群体,士大夫历来是一个庞大的社会阶层。虽然庄子不入仕,但文士入仕毕竟在任何时代都占士人去向的主流。“顺人而不失己”就是庄子对朝廷之士人格的要求,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庄子·人间世》中。《人间世》意在讨论个体生命的处世之道,既表述了庄子所主张的处人与自处的人生态度,也揭示出庄子处世的哲学观点。王夫之说:“此篇为涉乱世以自全而全人之妙术,君子深有取焉。”⑬庄子借书中人物之口说:“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为无町畦;彼且为无崖,亦与之为无崖。达之,入于无疵。”⑭庄子提出了顺物而不失己的思想,也就是在顺应对方的前提下慢慢引导对方,让对方入于无疵之境。庄子认为,作为臣子处世必须以顺应物情为前提,但顺应物情并不是丧失自我。这个自我乃是符合老庄思想的我,是一个崇尚自然、追求自由精神的我。

概之,在向秀的玄学理论中,“顺名教而任自然”是一种重要思想,它导源于庄子的“顺人而不失己”。不论是庄子的“顺人而不失己”,还是向秀的“顺名教而任自然”,相对于“顺人”和“顺名教”来说,

---

① 杨伯峻:《列子集释》,第 76 页。
② 杨伯峻:《列子集释》,第 75 页。
③ 杨伯峻:《列子集释》,第 58 页。
④ 杨伯峻:《列子集释》,第 72 页。
⑤ 杨伯峻:《列子集释》,第 49 页。
⑥ 郭庆藩:《庄子集释》,第 126 页。
⑦ 杨伯峻:《列子集释》,第 75 页。
⑧ 杨伯峻:《列子集释》,第 73 页。
⑨ 郭庆藩:《庄子集释》,第 931 页。
⑩ 郭庆藩:《庄子集释》,第 31 页。
⑪ 郭庆藩:《庄子集释》,第 1092 页。
⑫ 郭庆藩:《庄子集释》,第 161 页。
⑬ 王夫之:《庄子解》卷四,北京:中华书局 2010 年版,第 108 页。
⑭ 郭庆藩:《庄子集释》,第 170 页。

“不失己”和“任自然”则更为重要,“顺人”“顺名教”是一种手段,“不失己”“任自然”才是终极目标。如果把顺名教与任自然视为同等重要,就不符合庄子思想,也不符合向秀思想。

二

向秀《庄子注》:“夫实由文显,道以事彰。有道而无事,犹有雌无雄耳。”①如果一种停留在书面上的思想,不能落实到实际行动中,这样的思想如同一座空中楼阁。向秀不仅提出了“顺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而且在实际中践行了这一思想。

在竹林七贤中,向秀是与嵇康相处时间最久的人。在阮籍、山涛等人先后离开竹林之后,只有向秀还陪伴在嵇康身边。对于嵇康和向秀而言,竹林之游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竹林七贤”时期。正始十年(249)正月,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清除了曹爽及其党羽,改元为嘉平元年。嘉平三年(251),司马懿死,司马师为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阮籍此年为司马师从事中郎。在阮籍、山涛相继退出之后,竹林之游进入第二阶段,此期的主要人物是嵇康、向秀、吕安三人,可称为竹林“三贤”时期。《世说新语·言语》刘孝标注引《向秀别传》云:“少为同郡山涛所知,又与谯国嵇康、东平吕安友善,并有拔俗之韵,其进止无不同,而造事营生业亦不异。常与嵇康偶锻于洛邑,与吕安灌园于山阳,不虑家之有无,外物不足怫其心。”②“秀与嵇康吕安为友,趣舍不同。”③《晋书·向秀传》:“康善锻,秀为之佐,相对欣然,傍若无人。又共吕安灌园于山阳。”④不论是在竹林七贤时期还是在竹林三贤时期,唯一全程陪伴嵇康的只有向秀一人。

这样的生活在嵇康被杀之后戛然而止。魏景元四年(263),司马昭借吕安事件杀害了嵇康。嵇康死后,向秀一时成为历史舞台上的焦点人物。《世说新语·言语》刘孝标注引《向秀别传》曰:“后康被诛,秀遂失图。”⑤《晋书·向秀传》云:“康既被诛,秀应本郡计入洛。”⑥对于向秀“举郡计入洛”的选择,历史上一直有不同的评价:或以为向秀“清悟有远识”,属于识时务者。他们认为魏朝权柄已经被司马氏集团牢牢控制,取而代之只是时间问题。在这种情势之下,士人再作反抗只会无辜牺牲。也有学者以为按传统的道德衡量,向秀此举无疑具有道德污点,但他这样做也是出于不得已,情有可原。也有学者认定此变节行为不可宽恕。《世说新语·言语》:“嵇中散既被诛,向子期举郡计入洛,文王引进,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对曰:‘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刘注引《向秀别传》略云:“后康被诛,秀遂失图,乃应岁举到京师,诣大将军司马文王。文王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能自屈?’秀曰:‘尝谓彼人不达尧意,本非所慕也。’一坐皆悦。随次转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⑦《晋书·向秀传》:“康既被诛,秀应本郡计入洛。文帝问曰:‘闻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为巢许狷介之士,未达尧心,岂足多慕。’帝甚悦。”⑧虽然记载不同,意思大同小异。向秀认识到,在司马氏的专制面前,一介布衣之士想要与之抗衡,只是以卵击石。不仅无法实现精神的自由,连自己的生命也无法存在。在不得已时,他践行了“顺名教而任自然”的人格模式。

“顺名教”可分为主动之顺和被动之顺。衡之于向秀的行事,他顺司马氏完全是被逼迫的。其《思旧赋》就是例证之一。《思旧赋》被《晋书·向秀传》全文收录,后来也被录入《文选》。李贽《焚书·思旧

---

① 杨伯峻:《列子集释》,第 71 页。
② 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第 93 页。
③ 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第 243 页。
④ 房玄龄等:《晋书》,第 1374 页。
⑤ 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第 93 页。
⑥ 房玄龄等:《晋书》,第 1374—1375 页。
⑦ 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第 93 页。
⑧ 房玄龄等:《晋书》,第 1375 页。

赋》曰:“向秀《思旧赋》,只说康高才妙技而已。夫康之才之技,亦今古所有,但其人品气骨,则古今所希也。……康犹为千古人豪所叹,而秀则已矣,谁复更思秀者……竹林七贤,此为最无骨头者!”①李贽和嵇康一样,都属于“千古人豪”,站在常人的视角看,他对向秀的评价并非持平之论。邓小军先生说:“向秀被迫与司马氏合作而内心不甘屈服,此情形与阮籍相似。向秀终能获得人们的谅解,其故在此。……亦有为保全家身性命,对统治者低头,但是内心则不甘屈服者,则似可以批评其软弱,原谅其苦衷,而肯定其不甘屈服。”②所见甚是。被迫与统治者合作,代不乏人。《后汉书·蔡邕传》载:“中平六年,灵帝崩,董卓为司空,闻邕名高,辟之。称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 蔡邕遂偃蹇者,不旋踵矣。’又切勅州郡举邕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③在强权对个体生命产生威胁之时,士人为了活命只好选择屈服,对于这种选择,后人也多能理解和宽容。嵇康和吕安以“乱上”罪名被杀,如果向秀入洛之后倾心投靠司马氏,丧失了自己的人格,他是不会写作《思旧赋》的,这或许会为他招来杀身之祸。“将命适于远京兮,遂旋反以北徂”,说明《思旧赋》写于刚刚面见司马昭不久,联系《思旧赋》的写作来看面见司马昭时的恭维,那样的恭维可以说是特定情况下的口顺而心不顺。面见司马昭之后,向秀急急忙忙回到了山阳,绕道去瞻仰嵇康故居。他徘徊在穷巷之空庐,“追想曩昔游宴之好”,悲从中来。“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惟追昔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踌躇”。④ “心徘徊以踌躇”是他当下内心的写照,“寄余命于寸阴”是他对未来人生的谋划。他对嵇康的思念真挚而强烈,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绝望。这足以说明顺名教不是他心甘情愿的选择。外物可以强迫他顺从,但不能改变他的内心。

从史实看,向秀后期也没有放弃老庄之自然,成为遵守周孔之名教的朝廷桢干之才。《庄子·刻意》:“语大功,立大名,礼君臣,正上下,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强国之人,致功并者之所好也。”⑤朝廷之士中,有人追求建功立业,以“尊主强国”为己任;有人贪恋禄位,以荣华富贵封妻荫子为目标。对照来看,向秀完全不属于这两种人。《晋书·向秀传》说:“后为散骑侍郎,转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卒于位。”⑥向秀进入官场之后,没有歌功颂德、曲意逢迎。“在朝不任职,容迹而已”,足以说明向秀的“顺名教”是以“任自然”为前提的。《晋书·任恺传》:“恺有经国之干,万机大小多管综之。性忠正,以社稷为己任,帝器而昵之,政事多谘焉。……充既为帝所遇,欲专名势,而庾纯、张华、温颙、向秀、和峤之徒皆与恺善,杨珧、王恂、华廙等充所亲敬,于是朋党纷然。……既而充、恺等以帝已知之而不责,结怨愈深,外相崇重,内甚不平。”⑦后人把任恺、庾纯、张华、温颙、向秀、和峤称之为玄学名士派,把贾充、杨珧、王恂、华廙等人称之为新礼法派。王晓毅先生说:“从政治立场上看,玄学名士与礼法之士并无根本差异,他们同样在司马氏兄弟执政时期参加了晋王朝的创建活动。但是,从思想信仰看,两派仍有一定差异,玄学名士派保留着道家的‘自然’情结。”⑧于此可见,即使在后期,向秀依然没有放弃老庄淡泊名利因任自然的思想。

许多学人都很在意嵇康对向秀的态度。《世说新语·文学》注引《秀别传》曰:“秀与嵇康、吕安为友,趣舍不同。嵇康傲世不羁,安放逸迈俗,而秀雅好读书,二子颇以此嗤之。后秀将注《庄子》,先以告康、安,康、安咸曰:‘此书讵复须注,徒弃人作乐事耳。’及成,以示二子,康曰:‘尔故复胜不?’安乃惊曰:‘庄

---

① 李贽:《焚书 续焚书》,北京:中华书局 2010 年版,第 206—207 页。

② 邓小军:《向秀〈思旧赋〉考论》,《文学前沿》2002 年第 1 期。

③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六十下,北京:中华书局 2003 年版,第 2005 页。

④ 房玄龄等:《晋书》,第 1375 页。

⑤ 郭庆藩:《庄子集释》,第 536 页。

⑥ 房玄龄等:《晋书》,第 1375 页。

⑦ 房玄龄等:《晋书》,第 1375 页。

⑧ 王晓毅:《郭象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69 页。

周不死矣!’”①汤用彤先生说:“《难养生论》与《庄子隐解》均作于子期入洛之前。”②此处的《庄子隐解》即《庄子注》。王晓毅先生说:“魏末‘竹林之游’时期的嵇康、吕安,正处于司马氏的政治高压下,他们以不妥协的态度激烈抨击礼法制度和纲常名教,而向秀《庄子注》的思想主调恰恰是以妥协态度论证现存一切礼法制度和纲常名教的合理性。以刚直不阿而闻名的嵇康、吕安,竟极口称赞这部与己主张格格不入的书,是不可思议的。”③即使向秀的《庄子注》之主体完成于后期,但他在竹林时期已经开始了《庄子注》,其基本观点应该早已形成。那么,面对向秀的顺名教而任自然的观点,嵇康为什么不曾拍案而起、拂袖而去?

将向秀的“顺名教而任自然”与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进行对照,“越名教而任自然”壮怀激烈、慷慨悲壮,但常常曲高和寡,只有豪杰之士才能坚守;“顺名教而任自然”相对温和低调,则容易为淡泊名利之士所选择。两者的相通之处在于“任自然”。方勇先生说:“嵇康是要求超越名教而达到‘任自然’,而向秀达到任自然的‘无心’则是可以顺名教的。”④前言如果把庄子的人格理论分为三重,最高的是理想人格,其次是隐士人格,再次是淡泊之士人格。嵇康站在庄子人格境界的第二层,向秀站在庄子人格境界的第三层,虽然他们所处的境界有高下之分,但“任自然”的精神都与庄子思想相通。同时向秀的顺名教并不是一种主动的顺从,而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正因为如此,虽然观点相异,“趣舍不同”,嵇康也不会完全排斥向秀之见。颜延之《五君咏》同时写到了嵇康和向秀,其《嵇中散》云:“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形解验默仙,吐论知凝神。立俗迕流议,寻山洽隐沦。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其《向常侍》云:“向秀甘淡薄,深心托豪素。探道好渊玄,观书鄙章句。交吕既鸿轩,攀嵇亦凤举。流连河里游,恻怆山阳赋。”⑤他把嵇康比喻为大鹏和飞龙,把向秀写成甘心淡泊的探道之人,对两人的把握完全准确。面对社会体制的铜墙铁壁,嵇康宁鸣而亡,献身于理想,是一种选择;向秀面对名教口顺而心不顺,外顺而内不顺,也是一种选择。我们可以敬仰嵇康,为嵇康喝彩,但我们也不能鄙薄向秀。人中龙凤毕竟是个别的,相对那些虚伪的礼法之士,能做到向秀这样淡泊名利因任自然也已经难能可贵。

三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言语》:“观《文学》篇注引向、郭《逍遥》义,始末全同。今郭注亦具载之。则此篇之注出于向秀固无疑义。……要之魏晋士大夫虽遗弃世事,高唱无为,而又贪恋禄位,不能决然舍去。遂至进退失据,无以自处。良以时重世族,身仕乱朝,欲当官而行,则生命可忧;欲高蹈远引,则门户靡托。于是务为自全之策。居其位而不事其事,以为合于老、庄清静玄虚之道。我无为而无不为,不治即所以为治也。”⑥说魏晋士大夫“居其位而不事其事”,一面“高唱无为”,一面“又贪恋禄位”,是完全正确的。但据我们的分析,向秀并不是贪恋禄位之人。其实,从向秀的“顺名教而任自然”到两晋士族观念之间发生过一次转变,这次转变的枢纽是由郭象掌控的。

学界通常认为,经过向郭的共同努力,形成了“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⑦的局面。同时,也形成了这样一种观点:向郭《庄子注》名义不同,但“其义一也”。《世说新语·文学》:“郭象者,为人薄行,有俊才。见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

---

① 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第 243 页。
② 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96 页。
③ 王晓毅:《郭象评传》,第 78 页。
④ 方勇:《庄子学史》(增补版),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540 页。
⑤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二一,北京:中华书局 2012 年版,第 303—304 页。
⑥ 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第 94—95 页。
⑦ 房玄龄等:《晋书》,第 1374 页。

篇,或定点文句而已。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①虽然有郭象“遂窃为己注”和“扩而充之”的争议,但并没有影响到“向郭二《庄》其义一也”说的迅速流行。据《世说新语·文学》:“《庄子·逍遥篇》,旧是难处,诸名贤所可钻味,而不能拔理于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马寺中,将冯太常共语,因及《逍遥》。支卓然标新理于二家之表,立异义于众贤之外,皆是诸名贤寻味之所不得。”②在支道林提出新解之前,东晋玄学界一直将向郭二家并称,把他们对《庄子》的解读并称为“向郭义”,视为一个整体。

向郭哲学各有所长。王晓毅先生说:“传世的郭象《庄子注》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杰作。它不仅集魏晋玄学之大成,而且在魏晋南北朝思想史上,没有一本著作能从整体上超越它的分量。”③单就自然与名教的关系而言,继向秀“顺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之后,郭象主张名教即自然,提出了“与世同波而不自失”的思想④。郭象继承了向秀“自然无心”之说。向郭《人间世注》:“夫无心而应者,任彼耳,不强应也。”⑤《大宗师注》:“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富,其所宗而师者无心也。”⑥郭象《庄子注》说:“世以乱故求我,我无心也。我苟无心,亦何为不应世哉?然则体玄而极妙者,其所以会通万物之性,而陶铸天下之化,以成尧舜之名者,常以不为为之耳。孰弊弊焉劳神苦思,以事为事,然后能乎?”⑦在继承了向秀“自然无心”思想的同时,郭象也对其做了重大改动。郭象《庄子注·骈拇》说:“夫仁义自是人之情性,但当任之耳。”“夫仁义自是人情也。”⑧《庄子注·天运》:“夫仁义者人之性也。”⑨郭象把名教的根本——仁义看成一种普遍的人性,灌注到他的《庄子注》中,这是他与向秀的根本分别点。向秀表面上顺从强权政治,内心依然保留自己的思想。向秀之顺名教是被动的,郭象之顺名教是主动的;向秀是屈从,郭象是顺从;向秀是口顺心不顺,郭象是心口皆顺。正始时代,王弼哲学以无为本体,主张名教本于自然;在王弼之后,郭象哲学调和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主张名教即自然。王弼和郭象都意在利用自然服务名教。经过了郭象对向秀思想的吸收和改造,向秀“顺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转变为郭象“与世同波而不自失”的思想,遂成为两晋南朝士族的主导思想而盛行于世。

两晋南朝士族为了各自家族的利益不得不承认皇权的合法性,同时很多士族都追求庄子式的洒脱自由,他们兼有尊显的达官与清高的名士两种身份,既贪恋世俗的富贵又标榜山林之风流。开始是向秀的“顺名教而任自然”,接着是郭象的“与世同波而不自失”,向郭理论的先后出现使士族名士们找到了精神上的寄托。《晋书·刘惔传》:“尤好《老庄》,任自然趣。……年三十六,卒官。孙绰为之诔云:‘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时人以为名言。”⑩这种“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不是一个刘惔个人的写真,而是东晋名士共同的精神追求。《世说新语·简傲》:“王子猷作桓车骑骑兵参军,桓问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时见牵马来,似是马曹。’桓又问:‘官有几马?’答曰:‘不问马,何由知其数?’又问:‘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王子猷作桓车骑参军。桓谓王曰:‘卿在府久,比当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视,以手版拄颊云:‘西山朝来,致有爽气。’”⑪王子猷现象不是孤立的个

---

① 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第 244 页。
② 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第 260 页。
③ 王晓毅:《郭象评传》,第 2 页。
④ 郭庆藩:《庄子集释》,第 444 页。
⑤ 郭庆藩:《庄子集释》,第 154 页。
⑥ 郭庆藩:《庄子集释》,第 227 页。
⑦ 郭庆藩:《庄子集释》,第 36 页。
⑧ 郭庆藩:《庄子集释》,第 325、327 页。
⑨ 郭庆藩:《庄子集释》,第 521 页。
⑩ 房玄龄等:《晋书》卷七五,第 1991—1992 页。
⑪ 刘义庆著,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第 908—909 页。

案,他是一代名士的楷模。《宋书·谢瞻传》:“弟晦时为宋台右卫,权遇已重,于彭城还都迎家,宾客辐辏,门巷填咽。时瞻在家,惊骇谓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归趣乃尔。吾家以素退为业,不愿干豫时事,交游不过亲朋,而汝遂势倾朝野,此岂门户之福邪?’乃篱隔门庭,曰:‘吾不忍见此。’”①陈郡谢氏享有盛名,其家族“以素退为业,不愿干豫时事”的家风成为当代的流行风尚,到了南朝之后此风愈烈。赵翼《廿二史札记》“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条云:“至宋、齐、梁、陈诸君,则无论贤否,皆威福自己,不肯假权于大臣。而其时高门大族,门户已成,令仆三司,可安流平进,不屑竭智尽心,以邀恩宠;且风流相尚,罕以物务关怀,人主遂不能藉以集事,于是不得不用寒人。”②几乎所有的高门士族都不再惧怕皇权,他们“不屑竭智尽心”,以风流相尚。不再关心社会疾苦和朝廷兴亡。表面上看,此风始于向秀的“顺名教而任自然”,实际上向秀生活在魏晋易代之际,在强权威压下,他的抉择关涉性命之存亡;在他身后,时已过境已迁,东晋南朝的高门士族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地位特殊,势力强大,他们的“顺名教”和“任自然”都有了与向秀截然不同的内涵。

王弼哲学以无为本体,认为名教本于自然;嵇康倡导“越名教而任自然”,以自然对抗名教;郭象哲学调和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主张名教即自然。向秀“顺名教而任自然”的处世之道导源于《庄子》的“顺人而不失己”,它更接近于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而不同于郭象的“与世同波而不自失”。“顺名教而任自然”既反映在向秀的《庄子注》中,也体现在向秀的仕途实践中。这种处世之道经过郭象的改造之后,在东晋南朝时代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Xiang Xiu's Philosophy of Life

Sun Mingju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The essential issue of Neo-Taoism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was how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fucian orthodox teaching (名教) and the Taoist idea of Nature (自然). In the mainstream view, Xiang Xiu (227-272, 向秀) held that "orthodox teaching" (名教) was "Nature" (自然), striving to mediate their relationship. However, judging from his Commentary on Zhuangzi (《庄子注》) quoted by surviving texts and his personal experience as an official, Xiang Xiu had no intention to mediate this relationship. His philosophy of life can be summarized as "adhering to the orthodox teaching and following the Nature", which was originated from Zhuangzi's idea of "following others, but not losing one's self". In his mind, "following the Nature" was the purpose while "adhering to the orthodox teaching" was only the means. So far as "following the Nature" is concerned, Xiang Xiu's idea of "adhering to the orthodox teaching and following the Nature" was much closer to Ji Kang's (嵇康) idea of "transcending the orthodox teaching and following the Nature", but was far away from Guo Xiang's (郭象) idea of "going with the stream but not losing one's self". Xiang Xiu's philosophy of life exerted an influence over the society inthe Eastern Jin Dynasty and the Southern Dynasties.

Key words: Xiang Xiu (向秀), Neo-Taoism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orthodox teaching (名教), Nature

(责任编辑　郑　园)

① 沈约:《宋书》(修订本)卷五六,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1699—1700页。
② 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82页。